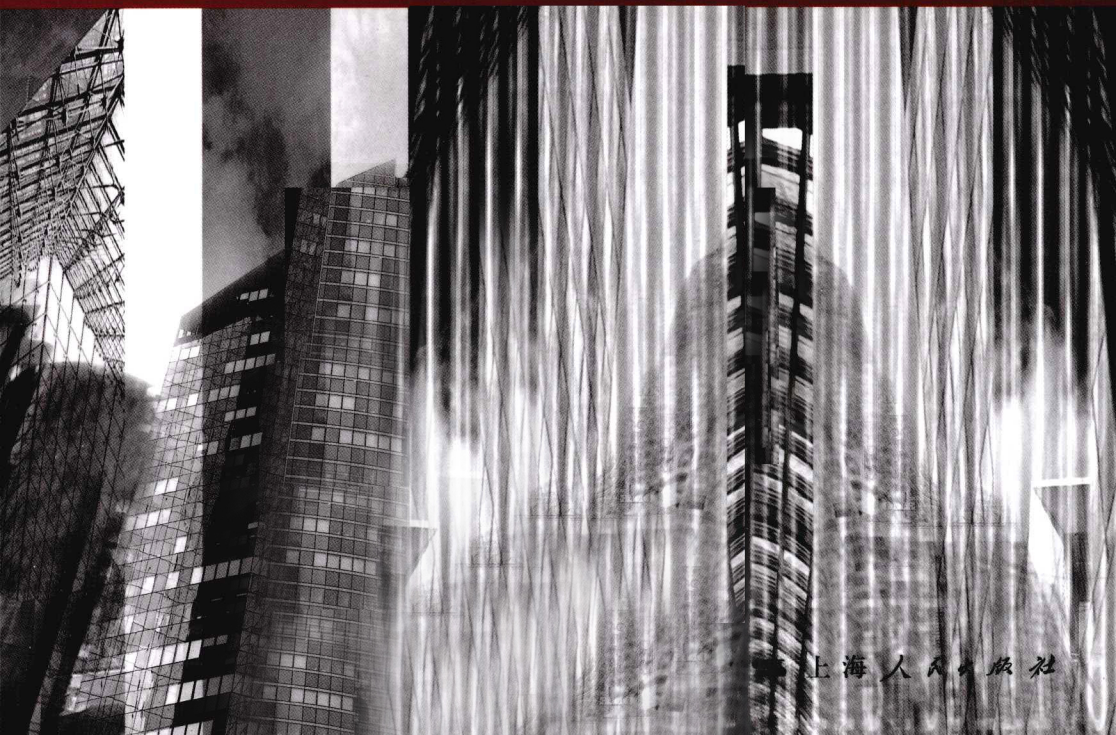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美] 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美] 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美)哈维(Harvey, D.)
著;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ISBN 978-7-208-09569-4

I. ①正… II. ①哈… ②胡… III. ①政治地理学-
研究 IV. ①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560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美]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4.25 插页 4 字数 486,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69-4/B·844

定价 58.00 元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目录

导论/1

第一部分 导向

第一章 战斗的特殊主义和全球抱负/21

第二章 辩证法/54

第三章 莱布尼茨的奇想/79

第四章 话语的辩证法/88

第五章 历史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地点/110

第二部分 环境的本质

第二部分前言/133

第六章 对自然的统治及其不满/136

第七章 评价自然/170

第八章 社会和环境变迁的辩证法/200

第三部分 空间、时间和地方

第三部分前言/235

第九章 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238

第十章 时空之流/282

第十一章 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334

第四部分 正义、差异和政治学

第四部分前言/379

第十二章 阶级关系、社会正义和差异的政治地理学/385

第十三章 正义的环境/421

第十四章 可能的城市世界/462

参考文献/502

索引/518

译后记/535

导 论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加有关“全球化”的研讨会。最为有趣的是 1994 年 11 月在杜克大学召开的那次。来自不同国家、学科和行业的人士济济一堂。那也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机会，听听来自韩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埃及等国学者、活动家和艺术家代表的声音，以打发冗长乏味的有关“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越来越被愤世嫉俗地称为“全球胡扯”（globaloney）]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美大学中经常发生。不过，大会气氛往往都很紧张，很难达成什么最终成果。这种状况说明，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那样的吹毛求疵的思潮侵袭了整个世界。

在北卡罗来纳州达拉谟的奥姆尼宾馆的经历使那次会议值得回忆。许多家庭——非常与众不同的家庭——也住在那家宾馆里。男人们穿着较为宽松的套装、运动夹克或法兰绒服装，往往打着大领带。孩子们表现得十分得体，男孩子通常穿着运动夹克或法兰绒服装，女孩子们则大多穿着镶边的正装。妇女呢，她们都穿着长及脚跟的正装，极为特别的是，全都留着长发，唯一允许的离经叛道行为是把长发挽成圆髻。这绝不是 Levi's、Calvin Klein 或者 Benetton 等这些名牌的样式（尽管可能是 Laura Ashely 设计的），也不是常见的牛仔风格。他们每个人都那么友好，与那些在衣饰上显然不同的人打招呼，问候别人“你好”或者“午安”。

我很好奇地关注这群人，不久就发现，这是东南地区福音会圣灵降临节传教士会议。我饶有兴趣地留了下来。参加了一次晚会，学到了

- 很多东西。例如，我忍不住把圣灵降临节教徒会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热心、快乐和活力与全球化会议上的焦虑和竞争的紧张作一对比。尽
2 管白种男性教士（在此不考虑根据性别和种族标准对计划所做的平衡）主
宰着集会，但显然与校园听众充满怀疑和怨恨的消极情绪不同，在这
里，热心听众参与的水平程度都很高。对于圣灵降临节教徒来说，
集会追求的是情感和激情融合，而不是知识上的一致，这个目标很清
晰。我不知道全球化会议是否有类似的清晰目标。要给这个问题找一个
明确或合乎逻辑的答案是很费劲的。

那天晚上，主持仪式的传教士做了如下祈祷：“四天来，我们最终
理解使我们团结如一人那种基本信仰。”**基本信仰**！我不知道，如果
在全球化会议上谈论基本信仰，那将会发生什么事。解构主义者将带
着冷冰冰的严谨继续干自己的事，相对主义者可能报以冷冷的讥笑，批
判理论家们会擦擦他们的手说“这简直不可能”，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大
叫“整个一只恐龙！太落后了”。我自己也同意，应该仔细审查和质
疑全部基本信仰。但让我困惑的是那种想法：当一个以坚定而强大的
基本信仰武装起来的政治组织对抗一群怀疑主义者，而后者唯一的基
本信仰是怀疑所有的基本信仰，那么预测赢家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
使我想到下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批判分析的任务不是证明基本信仰
（或真理）的不可能性，而是为基本信仰寻找一个更加令人鼓舞和充分
的基础，它使得解释和政治行动充满意义、具有创造性并成为可能。

本书试图为理解时空、地方和环境（自然）定义提供一套有效的基
本概念。当然，这种寻求基本概念的批判性研究并非微不足道或者容易
的事。它只是要求为研究建立一种形而上学基础。但是，在今天的学
术界，把任何东西说成是“形而上的”，都是危险的事。因为，这意味
着渴望我们身外（或内部）的某种神秘东西，借助于它们，我们使混乱
的影像之流、转瞬即逝的表象、被扭曲的定位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碎片
成为稳定的秩序，在其中，我们获得自身的集体存在。但是，传统意义
上的形而上学恰恰是从事这种批判研究的，它承认激情、情感、理性以
及理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那种平衡并不总是

容易达到。例如，如果圣灵降临节教徒处在过高的情感状态以及对某种极为严格的目标的激情和欲望的集体氛围之中，那么我们学者则一定会错误地过度迷恋理智的和高度学科化(disciplined，在这个词的肯定和否定双重意义上说)品质，这是我们自己个人主义的、职业规定的、碎片化的且往往自以为是的事业之品质。充其量来说，形而上学不过是寻求一般原则来理解而不是压制物理、生物和社会生活的显著复杂性。这种探究绝非易事，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发现自己渴望圣灵降临节教徒信仰、客观主义信念或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简朴性。

随着遇见圣灵降临节教徒的那个夜晚慢慢地过去，我也认识到，那种场合存在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目标。这就是种族主义。据说，基督之血将洗尽所有种族差别的符号。教会把其内部的种族歧视为自身权力扩张的障碍，并且在特殊场合，一个又一个教士都在劝诫白人团体以快乐、谦卑和理解来包容其黑人同胞。因此，一个在美国南方传统语境中可能对种族融合抱有敌意的人，最终不仅(至少表面上)热忱地接受了他当面的黑人同胞，而且接受了主和教会眼中的种族平等观念。种族主义行为是破坏性的、堕落性的和令人沮丧的，我现在正好支持几乎所有在美国缓和这种行为的事情。当然，对我来说，在那点上，圣灵降临节教徒一个晚上的说教所带来的成果似乎比二十多年里我自己的大学对那些肯定行动观念所做出的动听的口头承诺要大得多。不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显然，罪恶仍在某些地方存在着，而且，把犹太人当成背信弃义的人和杀害基督的凶手来加以谴责，这些行为仍然在圣灵降临节教徒的活动中弥漫着。这使我怀疑：机会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也被这种企图所主宰——清除那些或隐或现地支持法兰肯的“伊斯兰国家”的非洲裔美国人。

离开会场的路上，我不仅碰到成群结队的传教士，他们热情洋溢地宣讲自己曾是怎样罪恶深重的罪人以及重新发现主的道路是如何惊奇，而且路过成排的货摊，它们推销各种各样的商品，从宗教纪念币、书籍到T恤衫。一件特殊的T恤吸引了我，我忍不住买下。这件T恤由

“义服，以基督为中心的公司”（*Righteous Wear, a Jesus Christ Centered Company*）生产，它以醒目的颜色印着：

GET RIGHT

OR

GET LEFT

我想，解构主义者可能会对那句口号大加攻击。口号来自《传道书》（10：2）和《马太福音》（25：33—34）。在宾馆里，我方便地得到吉迪恩版权的《圣经》。去房间的路上，我找到了两处引文。《传道书》只是说：“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我并不介意这种说法，因为成为政治左派以来，我自己早就认识到，试图改变世界确实有点傻气。不过，《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就非常令人不解了。^①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那样，上帝把人区分为不同的民族。被安置在右边的绵羊得到了王国，而被安置在左边的山羊则被诅咒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上帝不是一个左派同情者，但他施以这样绝对的诅咒似乎有点过分了。今天，这已成为一个笑谈。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山羊被诅咒呢？上帝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马太福音》25：42—43）

山羊抗议道，他们并未曾见上帝饥渴、露体、生病和进监。上帝指出在他们的周围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人，并且说：“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现在，这些都碰巧成为相当老套的和传统的——甚至我敢说——也

^① 《马太福音》25：33—34 的内容是：“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译者注。

是“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价值。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全球化会议几乎不关注这些问题呢？而且，宗教“右派”现在怎么会把这些说成是他们的事？在最后一点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挑衅性想法。如果上帝存在于空间某处，那么看起来在他左边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右边！这就和一个远非微不足道的问题联系起来了：莱布尼茨——我将经常援引他的观点（特别是第十章）——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并以神学为根据主张相对的时空观。那种神学认为，由于认为上帝好像存在于时空中（而非时空的创造者和主人），绝对理论削弱了上帝的权力。在莱布尼茨看来，谈论上帝的左边或右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遍布宇宙的无所不在的力量，而非坐在某处时空俯视万物变化的人。

看起来是 17 世纪不可思议的神学论战，却在当代产生了巨大反响。当前，为艺术、政治学、人文研究、文学和社会理论等领域提供“认知地图”^①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随便举几本书，如《图绘西方左派》，《图绘意识形态》或《定位文化》等），在其中，各种政治团体、立场、观点和运动的相对位置问题已经成为评价和判断的主要标准。但讨论不幸地回避了如下问题：认知图绘活动需要一张地图，而各种地图一般来说都是总体化的，通常是二维的、笛卡尔式的和非辩证的，借助它们提出的问题则可能良莠不分。例如，（像欧拉和高斯那样的）数学家很久以前就证明，把地球表面精确地绘制在一张纸的平面上而不发生扭曲，这是不可能的。地图投影（包括其拓扑学类型）的历史表明，制图系统的无限可能性也包含了下述可能：依据某种特定的投影方式，可以把左转化成右，或者把它们两者取消了。这并不是说地图是无用的——问题远非如此（而且，我在本书中将经常借助地图）。但是，制图比喻包含（且有时候模糊）了再现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不假思索地选择某一而不是其他特定的投影（projection）（我故意同时在数学和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时产生的。在我看来，左/右（激进/反动、

① “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这个术语出自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哈维在这里列举的几本书，多出于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 VERSO 出版社与《新左派评论》杂志社合作出版的“图绘”（MAPPING）读本系列。——译者注。

进步/保守、革命/反革命)的修辞在今天就没有多大用途,因为这些术语被赋予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意义(经常依据不加说明的配置地图)。在下文中,如果我一般地诉诸二元的“亲”或“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那出于提出更清晰的讨论术语的愿望,即便这样做,我也会立即承认,那种二元区分是相当混乱的。

但是,通过那种(神学的或其他种类的)神秘主义观点来逃避上帝的最后审判,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反思的问题是,在表面上具有“激进”和“左派”导向的有关全球化会议(包括我自己)怎样有利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广泛地追求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目标。在我看来,揭示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基本信仰是不够的,尽管它们可用于孤立地理解抽象术语或者有关时间、空间、地方和环境(自然)的具体政治学。诸如此类的研究应该同时追求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问题的政治承诺。因此,关注社会正义(以及理解那些有关争议术语的基本信仰并使之切实可行)需要面对如下问题:如何理解基本的地理学概念。

“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问题是全部争论的交点。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特别地,通过那些我们大体上能够改变和控制的人类活动),也需要批判地评价这样生产出来的差异之正义或非正义性质。像多数社会主义者那样,我也会依赖平等原则,但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抹去各种地理差异(甚至假设在一个包含尼泊尔、尼加拉瓜、芬兰、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世界上想抹去那种差异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平等原则很可能必然包容某种有益的地理差异的增殖(这直接导致解释怎样才算“有益”的问题)。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最值得大力研究和关注的概念。进一步说,任何称职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都必定承认,在研究“什么是/不是正义”这个问题时,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暗示着完全不同的回答方法。因此,我采纳的基本论点(我认为在今天多数人将愉快地接受的论点)是,空间和生态差异不仅被“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的过程”所构造,而且由它们构成。这带来了进一步难题,这种过程由可

能用来评价和改变它本身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正义标准所构成。我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一套稳定的概念工具，来探究这些关系的公正性，并且证明正义的含义如何反过来得以历史地和地理地构建。同时，我也认为这项工作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寻求基本原则。

在此，我预先列出本书各章中将展开的一般性主题。

一 辩证法难题

首先，我提出一种辩证的和相关的方法^①。辩证法的本质常常被误解，此外，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辩证法形式。因此，建立某些初步的辩证法原则(第二章)，作为理论和概念实践指南，这是明智的(如我解释的那样)。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辩证法”这个词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前途，或者过于深奥难懂；而对另一些人，比如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那些人，辩证阐述现在则是老生常谈。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社会科学中，对这种思想方式的抵制比过去更强大了(即使撇开政治含义不说，不仅在实际的实践而且在解释和意义方面，它同样挑战统计学方法和数学模型程序的标准应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文学理论的立场相同，强烈反对大部分社会理论、物理学、生物学和工程学，这些学科轻松地且常常不假思索地把理论建立在实证主义的或简单的经验主义思维和工作模式之上。我奉劝这些领域的同仁们，辩证方法能够加深对社会—生态过程的理解，而无须完全拒绝或抛弃由其他手段得出的结论。我将特别提供一种强调关系和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来反对那些孤立的因果链以及无数孤立的且有时矛盾的假设，这些假设只是在微不足道的统计学意义上才具有正确性。因此，辩证法家的部分工作

7

^① relational 是一个关键词，亦被译为“关系的”。它表明哈维是从关系入手来推进空间理解的，这个特征不只是强调“相对性”，而是把相对性归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译者注

就是，翻译和转化不同研究结构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并揭示这种转化和翻译如何表现出新的且往往有趣的洞察力。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些对这个过程的限制，产生一些不是不可能就是很难翻译的难题和问题残余。很明显，在诸如空间、时间和自然这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解困难。我多半集中于这些主题，所以由辩证论证和实践产生的差异始终非常显著。

二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难题

尽管辩证法在社会、物理、生物和工程科学中相对较弱，但它在某些人文科学部门中却是常见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在文学理论的哲学化浪潮中以及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和许多其他人的广泛影响下，它变得十分强大。例如，因为一些有趣的原因，我所采纳的关系辩证法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巨大进展。据弗里德曼(Friedman, 1995)说，“关系位置的文化叙事”使女性主义者能够跨越她称为“拒绝、谴责和忏悔书写”的那种边界，这些“书写”依赖简单的二元论以及往往本质主义的范畴(如，妇女/好：男人/坏)。在关系框架中，“身份随着不断变化的语境而转变，取决于参照点”，所以不存在本质或绝对。“身份是各种流动的地点，人们可以根据形式和功能之有利位置来做出不同的理解”。我坚决支持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我的论证也因此在各种对立的潮流中小心地穿梭(或许，想到了那些福音会教士的简单二元论的力量)。

把万物都还原为洪流和潮流(fluxes and flows)，随后对全部形式和位置之短暂性的强调便有自身的限制。如果全部固定的东西总是瞬间就烟消云散，那么做成什么事都是很困难的，甚至做出什么决定也都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回到简单的基本信仰(不管它们是右派对家庭的崇拜，还是左派对“抵抗”的崇拜)，以及抛弃无法控制的以过程为基础的论证，都是很强的诱惑。我认为，这种诱惑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不

过，尽管我接受这种一般论点，即在理解世界时，应该给予过程、洪流、潮流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我也希望主张，这正是我们应该仔细关注我称为“永恒”之物的原因，那种“永恒”之物包围着我们，并且我们也构造它们来帮助充实自己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进一步来讲，万物——甚至包括，如怀特海所言，克里奥帕特拉之针和斯芬克斯——都可以还原为流，尽管这一观点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却被各种各样的物、制度、话语，甚至被那种对相对的永恒和力量的信仰所囚禁，拒不承认那些显而易见的性质将是很愚蠢的。我相信，人类无法看到归根结底，所以很少有人著名的“归根结底”意义上^①主张“所有永久和永恒都瓦解了”。在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石”过去习惯于强调，辩证论证不能被理解为外在于具体的物质条件，我们在其中发现自己；并且在严格的“具体”字面含义上（至少与人类行动的时空有关），那些具体的条件常常是持久不变的，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永恒性、意义和力量。

所有这些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例如，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热衷于流的著作中，德里达非常奇特的幻想不知何故被视为完全激进的和革命的。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手段是把“辩证法”同历史—地理条件的全部确切意义以及具体的和组织化的政治学之根基割裂开来。这样，德里达就能够想象一种“无形态、无称号、无名字……无政党、无国家、无民族共同体的新国际”。如伊格尔顿评论的那样，这是“后结构主义的最终幻想：一种没有枯燥体系或乏味‘正统’作为自身反对立场的反对立场；一种任何话语都不能表达的不同意见；一种在实现行动中背叛自身的诺言；一种永远激动不已的朝向救世主的开放性，那个救世主最好不要作为某种确定的东西降临，以免让我们失望”（Eagleton, 1995:37）。

为了以任何有意义的和确定的道路来改变世界，我们需要不仅理解

^① 指恩格斯以“归根结底”概括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这个著名的例子。——译者注

而且创造永恒——组织、制度、学说、计划、形式化了的结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那种已经成为纯粹唯心主义的关系辩证法类型有很大的不同。我试图在人类行动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为政治寻求一种更加坚固的基础。因此，我反对一种正在出现的趋势，它建立在辩证的和关系思维方式之上，产生了可以被称为“新唯心主义”的东西，它认为，思想和话语是塑造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变迁之历史地理的根本原因。

9 三 理论化难题

在今天，人们广泛地谈论“理论化”或“修正理论”的实践。这也是我所关心的事，不过，我还得赶紧补充一点，“理论化”和“理论”这些术语的含义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的。当然，当我采取一种辩证的（相关的）、历史—地理的和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知识时，这些术语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并且，创立理论的规则与解释理论框架的规则（比如用一种分析的或实证主义的方法）在此也完全不同。使用不同工具创立的知识和理论并非完全不能相互兼容。不过，它们之间却不能直接同化。我的一般看法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地理的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因其以某种方法处理了总体性、特殊性、运动和不变性，所以维持了在其框架内包容其他形式理论框架的前景，有些时候原有框架的整体性仅受最小损失（尽管在其他一些情景中，损失将是实质性的）。在此，我并不关心对那种论点正当性的证明。但是，这里有一个思考方法，它对其后论题是如此重要，值得预先讨论。

把空间探讨引入大多数（辩证的或非辩证的）社会理论之中，在如何说明和运用理论这个问题上，常常会引起巨大的混乱。（诸如马克思和韦伯提供的那些）社会理论的元叙事通常集中于时间变迁过程，而保持空间的恒定性。如果空间通常打破了公认的理论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元叙事，那么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试图打破它们的人都能够借助于某种空间

性十分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我想，这说明了空间比喻为什么会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著述中突然火爆(福柯的著作在这一点上极为清晰)。

但是，在此，我也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奇特的位置。因为，一方面，尽管我欢迎那种空间兴趣的高涨(再次强调，文学中的这种兴趣要胜于社会理论)以及某些文本和论点的扩散，它们纠缠于空间性所表示的一切事物，但是另一方面，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工具又会在本质上反对元理论，这绝非我的意图。我所关心的是，毋宁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重建马克思的元理论，以便把一种对时空性(以及社会—生态问题)的理解整合进其框架之中。这使我在写作的时候反对那些空间性和空间比喻的用法，它们的唯一目标在于获得不可调和的差异、不可通约性、特殊性以及不可还原的个体主义，使它们坚不可摧。

我的立场绝非论证空间性使理论处于不可能之境地。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这个计划并非没有困难(如本书某些论证的长度和复杂性所表明的那样)。但是，我想，对于“理论应该怎样解释”以及“一种‘元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将达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般理论是可能的。

10

四 价值问题和正义的本质

处在社会变迁的洪流和潮流之中，人们会求助于某种永恒的价值，以此鼓舞集体的或训练有素的社会行动。这已不是什么新思想。公元2世纪末某个时候，马可·奥里利乌斯皇帝在多瑙河沿岸某个潮湿而疟疾肆虐的地区扎营，徒劳地抵抗威胁着罗马帝国疆界和永恒性的那些野蛮部落。在其《沉思集》中，他写道：

一个东西急急地诞生,而另一个则匆匆地消失。甚至在一个东西产生过程中,它的某些部分就已经死亡。流变永不停息地更新着宇宙的结构……在这个不知疲倦的河流中,哪里存在着什么牢靠的立脚点,对人来说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评价从他身边飞逝的万物呢?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产生同感并不困难。但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不是尽管而是因为日常生活政治经济体制的显著不安全性和反复无常特征,并且在强调(甚至假设)流之反复无常的那些激进的人文艺术学科中也存在着类似偏见。正因为(文化中的)永恒假设或(宗教中的)终极真理假设给各种激进思想难以接受的价值提供了稳定性,所以在“价值”领域,保守的或宗教的思想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只要有有关什么是重要的或不重的判断在知识上是可以分析的,更不必说在政治上是可以为之奋斗的,那么,离开某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产生充满意义的政治行动(以及,就此而言,甚至充满意义的分析)。

当然,在某些研究中,“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被看得极为神圣。例如,允许价值进入科学的客观研究领域,经常被视为对全部证据和结果的玷污,并因此使它们可疑和无用。在辩证的/关系的视野中,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通过阴谋诡计,或者在某些极为有限的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合理地接受这个观念,即价值是或可能被视为恒定的)。如我们所见,在某些科学领域中,这种必然融合事实和价值的辩证的/关系的观点已经开始复兴,例如,在“如何解释量子理论”这个问题上的广泛争论。

在我看来,用对“评价过程”的理解来代替僵化的“价值”观念,可以解决这些难题。一旦过程的作用方式得到理解,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永恒”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和时刻得以建构,从而形成大多数人都心甘情愿地赞成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因此,在下文中,我会一直关注评价过程,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某些相对持久的价值在什么程度上可能或已经成为多种形式的社会生态行动